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提出,改革下一步就是要再出发。如何再出发?政府职能转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放管服”改革中,要做到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好,该服务的服务好。就高教领域而言,就是政府怎样让高校发挥办学自主权,并让办学自主权发挥好、利用好。这也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该怎么认识放、管、服三者的关系?改革又有哪些突破口?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

解决权力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率性问题

《中国科学报》: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您最看重、最期待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周洪宇:党的十九大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我关注了教育治理现代化,即在先进的教育治理理念引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通过科学有效的治理方式,使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等逐步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而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从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全面发展与升级,随之而来的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是根本性、全局性和深刻性的。用行政管理缺位、越位、错位制约学校办学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科学报》: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周洪宇:首先要解决的是教育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率性问题。

权力下放不充分,则抑制教育发展活力;财权、人权、事权不匹配,则制约教育改革。要真正释放基层教育改革的活力和创造力,就要敢于自我革命,要积极实行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新型关系。

《中国科学报》:在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的同时,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周洪宇:在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的同时,也需要“放管结合”,即在“放”的基础上,对“管”进行变革和创新。着力破解体制机制弊端,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已成为当前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共识。这就需要深入推进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

“放”是政府部门角色定位问题,就是要厘清政府、学校、社会的边界和相互关系,重点是如何补缺位、纠错位、控越位,让政府归位,考验的是政府定力和推动改革的动力。

“管”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转型问题,监管变革要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科技新进展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涉及管理体制、政府层级、部门职责、运行机制、法制保障等方面,目的是激发学校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服”的核心是政府通过树立教育治理理念,构建有效教育治理机制和体制,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不断优化教育服务水平。

依法利用好“三个清单”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其突破口在哪里?



周洪宇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

教育领域“放管服”要用好“三个清单”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总体上的“管”,关键在于依法利用好“三个清单”,即实施教育“权力清单”、厘清政府的教育“责任清单”、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依法管好“看得见的手”、用好“看不见的手”、挡住“寻租的黑手”。

周洪宇:如何推进放管服,突破口在于进一步明晰政府、高校、社会的权力边界。《高教法》中虽然讲明了高校有哪些权力,但是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权力的边界尚不明确。原则上说,政府该管的管好,但是政府该管的又是哪些?

比如,高校设置的问题,《高教法》中讲得很明确,在省一级政府的领导下,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实施的可能性,来批准、设置本省高校。然而,一所高校成立不只需要向省政府申报,还得向教育部行政部门备案。备案时,教育行政部门会考虑本地、本省有没有实力设置这样一所高校,无形中把备案权变成了审批权。为此,要把权力边界划清楚,理清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就需要政府进一步列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何开出这三份清单?

周洪宇: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总体上的“管”,关键在于依法利用好“三个清单”,依法管好“看得见的手”、用好“看不见的手”、挡住“寻租的黑手”。具体包括:

第一,实施教育“权力清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实行权责法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所谓权力清单,就是要以政府和部门清单的形式,依法界定各级政府和部门实施审批的事项、依据、内容和程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

会监督,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教育方面,国家没有授权的,政府不得法外设定教育权力(越位);凡是权力清单规定应该作为的,不允许政府推诿扯皮和敷衍塞责(缺位)。

第二,厘清政府的教育“责任清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政府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勇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

就教育来说,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政府依法全面负责并直接提供,主要通过财政向公办教育机构拨款,或者向需要资助的群体直接提供资助。对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依法承担有限责任,通过统筹常规拨款、专项资助和专门补贴等多种方式,将其作为重点放在符合条件的处境不利群体中,以及市场机制不易调节的领域;对绝大多数非公共服务,主要靠人力资源市场信号对供需关系进行调节,政府不承担直接资助和办学的责任,但必须建立健全准入标准和竞争规则,依法加强行政监管,并强化行业自律,对社会效益好的办学行为给予鼓励或奖励,对违法违规及失信行为进行惩戒处置。

第三,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所载明的就是底线、禁区。教育领域实行负面清单模式,清单之外的政府不再审批,各类主体都可依法进入,这样就可尽量缩小政府审批的范围,加上清单相对明确和透明,有利于减少审批自由裁量权,防止不当限制和行政垄断。因此,要对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服务性收费、职业资格、教育公共服务事项等,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清单之内必须为。

转变行政职能与削减审批事项

《中国科学报》:除此之外,您认为政府转变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还应该做些什么?

周洪宇:还应做到两点:着力推进政府转变教育行政职能,大力削减教育行政审批事项。

实施简政放权,首先就需要对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再垄断学校管理权,而是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只保留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给社会和学校,将强势政府对学校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政府、学校、市场、第三部门以及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多方共同治理。

比如,在教育体系构建方面,政府重点是对教育规模、结构、布局等方面进行宏观管理,核心是调整教育结构。彻底改变许多地方存在的重视公办教育、轻视民办教育,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重视正规教育、轻视非正规教育的做法,增进教育类型多样性。

全面清理规范性文件,尽可能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的行政干预,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清理有关教育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或宣布失效,或废止,或修改;减少教育行政审批申请材料,凡是不合法、不合理的申请材料,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大道至简的智慧,坚定不移把教育行政审批改革推向深入,一律清理取消;减少办理环节,凡是不合法、不必要的办理程序,要进一步减少;减少办理时间,严重影响行政审批整体效率、无法明确规定的部分环节的办理时限,要下决心明确和统一;减少自由裁量权,概念模糊、边界不清、自由裁量空间大的部分审批要素,要逐一细化和规范。

发展新模式

国学双语这一发展模式与教育部 2017 年版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的翻译能力发展目标相一致,即能翻译较为正式的议论性或不同话题的口头、书面材料。能借助词典翻译,有一定深度地介绍中外国情或文化的文字资料。同时也体现了该指南的教学方法目标,即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积极创建多元的教学与学习环境。鼓励教师建设和使用微课、慕课,利用网上优质教育资源改造和拓展教学内容,实施基于课堂和在线上课程的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学生朝着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方向发展。

在我国的国学双语教育发展中,一些高校已经在这一领域中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国学双语在我国高校博雅教育的实施还需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语翻译实践应成为教学的重点,如《诗经》《论语》、唐诗、宋词等的翻译实践,将英语翻译、法语翻译等不同语言的翻译教学实践,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学生习得外语能力的有效方法。

其次,处理好国学经典解读与双语翻译标准的关系,这也是高校实施国学双语博雅教育需注意的方面。通常,学生只有对国学经典有了足够的认知后,才能决定采用何种翻译策略进行双语翻译实践,要解决如传统的“信、达、雅”可否成为国学经典的翻译标准,或是遵照“以经译经、以诗译诗”的标准进行国学双语翻译等。

最后,国学双语的博雅教育需注重与“互联网+”的紧密结合,如基于课堂和在线上课程的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模式等,将国学经典解读纳入到现代信息技术中,成为网上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不断拓展国学经典的双语内容。同时,将国学双语博雅教育与影视、歌曲、动漫创作、自媒体、直播平台等有机结合,达到互动赏析的效果。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特聘教授。本文为陕西省社科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基于一流学校和一流学科建设欧洲大学与陕西高校教育模式比较研究》阶段研究成果、西安文理学院国学双语研习基地阶段研究成果)

高教观点

前不久,一份关于“985 工程”高校大学生毕业后择业地区的排行在网上引发热议,人们纷纷感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985 工程”高校毕业生所在地就业率偏低,对优质人才流动地域选择的偏好颇感担忧——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出现明显倒挂现象,一些人才培养高地还未享受人才集聚的红利,已然在城市引才竞争中沦为人才流出的洼地。尽管部分内陆城市纷纷拿出“抢人”政策红包,但依旧未能阻挡人才奔涌而出的洪流。

优质的高教资源集聚如若不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智力输出优势,那么,这种先天优势也终将在长期的“入超”“逆差”中黯然失色。

对于广大中西部的城市来说,要正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铁定规律,减少对人才成长发展的不当干预,营造利于人才晋升的公平生态,从而让活跃的经济留下人才,让公平、公正的氛围留住人才,让良好的生活配套留住人才。

在市场经济中,人才作为重要资源要素,自然受到市场的资源调配影响,多少年来,无论是人力还是人才多数呈现出“东南飞”的现象,中西部内陆城市虽保有的优质高教资源较为集中,但这一因历史原因造就的资源存量,却由于本地经济规模有限、市场化程度不一等原因,难以吸附高层次人才。同时,受制于率先开放,经济活跃的东部沿海城市对此产生的强大虹吸效应,中西部存量资源甚至一度被“釜底抽薪”,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的脱节倒挂引发了这些城市的警醒,也纷纷出台政策回流人才,但终究无奈强大的虹吸效应而作用有限。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西部内陆城市留下人才最为重要的是不遗余力发展经济,形成独具影响的产业经济规模,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激活各类市场经济主体,活跃经济发展要素,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自然也就留下了人才,如果没有这个最大增量,出台再多补贴的红利政策也难以留下追求生活质量的年轻人才。

如今,“985 工程”高校毕业生流向城市比例与 GDP 排行呈现高度吻合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这些城市要在当今产业升级与转移中,发展有别于既往的发展路径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优势,造就既有主导支柱产业,又有多元并举的经济规模,形成差异竞争,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角力的“黑马”,自然会导致人才回流,乃至成为人才争相前往的城市。

人才上升的通道是否顺畅,是否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衡量一个地区或城市风气是否开放,环境氛围是否公平公正的标志。无论是《中县干部》还是系列的“博士返乡观察”都显示,内陆城市熟人社会根深蒂固、权力对资源分配的不当干预等影响了人才正常的晋升渠道。在潜规则大行其道的内陆城市,人们既分享了乡土中国环境中的种种便利,也自然要失去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公平、公正的生态,以至于在这里,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上升的通道受阻自然增加了人才合理流动的不确定性;东部沿海城市得益于开放风气和高度的市场化程度,人才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发挥,能力和素养成为人才上升通道中的硬通货,人情社会等潜规则就只能靠边站。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西部内陆城市在发展壮大经济硬实力的同时,更要在制度、政策制定、执行的软环境上下功夫,人们都对怀才不遇心有余悸,要做到人尽其才,就需要开放的风气和透明的政策,要做到让规则说话有分量,只有如此“爱才惜才”的生态,才能使人才留下来又留得住。

做大经济增量和生态营造自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对人才回流的功能尚需时日,所以短期红利性政策作为权宜之计也是必然的,这往往体现在宜居对人才的引流作用上。

当前,人才流向东部沿海城市趋缓缘于高房价,这对不少中西部城市吸引人才大有好处。如今,一些房价平稳的中西部城市成为新晋年轻人青睐的“网红”,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出台短期红利政策、给予人才生活便利,既体现了城市对人才渴求的温情,又能与发达城市吸引人才差异化竞争,自然使人才逐渐回流。关心爱护人才还须非常规之道,西部某省会城市副市长曾表示,为了吸引人才回流,他会定期发送生日祝福短信给对接联系的高层次人才。显然,这些温情的细节也是不少地方应该学习的。

让高层次人才才留得住、留得住是首要解决的问题,让他们留得久也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一个宜居的城市自然让人才心生眷恋,在立业的基础上将他乡作家乡。

当前,人才流动偏向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写照,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要素——人才成为全社会的硬通货,市场起决定性的配置作用使得谁也无法对这种流动进行“截流”,但是对于广大中西部城市来说,打造经济充满活力、生态公平公正、生活宜居的宜业城市,自然就会对这股洪流起到直接的引流作用。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人才不能『截流』但可『引流』『回流』

■马星宇

国学双语之博雅教育

■赵硕

一直以来,国学双语教育是否走进大学课堂,成为中国特色的博雅教育,都是人们争论的话题。由于国学本身的深奥,加上将国学和双语联系起来,更加深了国学双语走进大学课堂的难度。

支持人士认为,国学本身就是经典,国学双语走进大学课堂更能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学生的语言翻译能力和认知水平,对于学生毕业后的创新创业发展,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有益之举。反对人士也有自己的理由,国学双语过于抽象,学生的汉学水平还未达到一定积淀,加之双语翻译或教育对于学生的认知过于抽象,不利于大学通识教育的扩展。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国学双语和博雅教育的关系。

国学双语的发展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国学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是涵盖了汉朝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及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和学术体系,也就是自“西学东渐”后所泛指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此来看,国学的涵盖范围极其宏大,所涉及内容包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对于高校学生认知的确有一定难度,但这恰恰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国学双语文化的契机。

以 2007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为例,该指南提出我国学生英语和文化素质的发展要求,即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运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因此,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

化知识的传授。从这一官方的大学外语能力发展要求来看,文化素养的提升已经成为大学外语教学的发展趋势。

近十年来,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已经在各高校中逐渐普及,跨文化交际的应用在大学外语课堂中取得了不俗成就,再加上各类外语竞赛,学生的跨文化素质培养发展较快。相较而言,我国的传统文化翻译与教育则尚未真正进入大学外语课堂,尤其是国人引以为豪的国学传统文化,如《诗经》《论语》《周易》以及唐宋词等的双语翻译尚未真正与大学的博雅教育接轨。

在这方面,我国的国学双语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而国学大师们也一直在这一领域不断推陈出新。如国学大师任继愈对《老子》的注解和阐释和其女任远教授翻译的英文版《老子绎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之子钱逊编著解读的《论语初级读本(汉英对照)》以及被称为“神还原”的赵彦春教授《英韵三字经》,这些国学双语成就为国学双语教育走进高校博雅教育课堂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2018 年 5 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国学双语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学双语研究已经走入了系统化发展的轨道,也为高校国学双语的博雅教育提供了发展契机。

欧美大学的国学双语教育

美国是一个仅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新兴移民国家,但也有自己的国学,如传承欧洲的古希腊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宗教神学等,而且美国有专门的智库机构进行相关的研究和普及。作为博雅教育的一部分,美国大学的国学教育既有欧洲古典文明和历史,又有体现其移民国家特色的亚裔、非裔文化,形式多种多样,而且通常将其国学教育与语言习得结合起来,体现了美国大学在国学教育的双语文化特点。

英国将莎士比亚文学列入国学的重要发展部分,莎士比亚文学已经成为英国大、中、小学必修课程,成为博雅教育的一大发展特色。英国教育机构希望通过对莎士比亚文学经典的学习,带动

民众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加深对英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培养本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标准。同时提升莎士比亚文学经典的翻译和传播度,扩大其在世界的影响力。

法国在其国学领域可谓群星璀璨,涌现了诸如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国学大师。法国古老的巴黎大学、索邦大学、蒙彼利埃大学等高校,也都非常重视学生的国学博雅教育,不但将本国国学经典作为通识教育课程,还将希腊、罗马的双语典籍及有关历史、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古典著作作为学生的经典阅读材料,将国学教育与传统语言学习结合起来。

同时,法国还非常重视“国学教育之请进来”思想,如十九世纪初,法国大学将《诗经》引入到通识教育讲座中,将我国的国学经典译成法文、拉丁文等文字供学生学习和研读。

在近代两百年发展中,德国进入了人文主义时代,博雅教育和个人能力发展理念进入到德国的大学课堂,出现了欧洲博雅学院。德国大学的博雅教育提倡整体性哲学的修养,康德、尼采、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成为德国年青一代继承传统文化和自我发展的基础。

随着德国大学新兴科学的不断发展,国学双语的博雅教育也成为洪堡大学模式的延伸,德国大学在追求科学发展和创新的体系中不断完善其教育范式。

国学双语能否成为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即素质教育,其宗旨在于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在我国社会中,博雅教育被认为是一种通才素质教育。但事实上,这种教育理念与先秦时代的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通常的儒家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先秦史学会国学双语研究会执行会长赵彦春认为,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学经典将通过双语形式,同“文化+”和“互联网+”紧密结合,通过图书、影视、歌曲及动漫创作、自媒体、直播平台、会刊等有机协同,探索具有核心竞争力的